

1301

台江文史資料



9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州市台江区委员会

6

目 录

接管旧政府，巩固新政权·····	曾祥荣（1）
解放初台江区农村减租与土改工作回忆·····	林增城（7）
福州解放后的第一次禁烟运动·····	曾祥荣（17）
天亮前后·····	卓秋阳（21）
解放前台江区的工业·····	李益清（32）
木雕之村——台江象园村·····	柯典良 林增城（43）
福州解放前夕的大罢市风潮·····	曾德举（49）
台江区的“发票行”·····	林祥彩（51）
洋中史话·····	邓 侃（54）
福州评话在台江·····	林祥彩（60）
茶亭街四变·····	许道章（71）
台江部分地名小考·····	王国维（74）
陈振龙·····	林家钟 肖忠生（82）
清末民初台江两位商业家·····	官桂铨（86）
南台谈往·····	郑丽生（89）
南台民间故事三则·····	林恩燕 李翼文（94）
历代咏南台诗选（续）·····	林家钟（98）

接管旧政府 巩固新政权

曾祥荣

一九四九年四月间，解放军渡过长江后，南下势如破竹。五月中旬已抵闽北，建瓯、南平等地相继解放，省会福州军政首脑机关人员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仍然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一面搞“应变”活动，一面制造政治谣言，重弹“共产共妻”滥调，蛊惑群众。

中国共产党福州地下支部同志掌握到情况后，为安定民心，消除国民党中下层人员和各民主党派、知名人士对共产党政策的疑虑，地下党陈耀明同志及时送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手抄本由“协记印刷所”印刷一千六百多份，确定统一时间于五月十九日下午三点同时投邮，寄给国民党福州的党、政、军、宪、警、特务机关的主管人员以及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社会团体的负责人，资财档案的经管人员和知名人士，共发了五百多份。五月二十日上午，公教人员及群众看到布告内容后奔走相告，窃窃私语议论。工商界人士看到布告中有保护工商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政策，十分高兴；知识分子看到有一技之长者量才录用，感到有出路；机关人员和资财经管人员看了布告后，知道保护好重要资财档案属为立功，万一福州解放了，共产党也不会追究责任。总之通过地下党的印送《布告》活动，给国民党军政人员交代了政策，指明了方向，消除了疑虑，安

定了他们忐忑之心，由于各单位的资财档案保护得比较完整，减少了我军在福州解放后接管工作的阻力。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解放福州市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第二十八、二十九军等部队参战，西向由闽侯白沙镇方向南下进城。北路部队由北岭下来，东路从宁德、罗源方向挺进福州。在几路部队包围中，国民党军队丢魂丧胆，溃不成军，不敢对阵，紊乱地向闽南厦门、金门等沿海岛屿撤退，最后渡海逃到台湾。

福州解放，所有单位都由部队实行了军事管制等待我军派人接管，这时部队机关早已组织一批来自上海等城市大专学生和干部聚集在闽北建瓯县等地，经过短期训练，介绍熟悉了福州市、区需要接管单位的内部情况。部队首长宣布，许亚为福州市市长，又宣布各区区长、公安分局长，中共区工委书记名单。八月二十四日由十兵团保卫部干事田舍，带领一批人员到台江公安分局接管，田舍任分局长兼中共台江区工委书记。李华民带徐永年、王桂教接管小桥公安分局，李任公安分局长兼中共小桥区工委书记。八月二十六日市军管会派姜斌任台江区区长，吴赋敏任副区长接管台江区公所。派顾耐雨带一批人员接管小桥区公所，顾任小桥区区长。（后任省政协秘书长，已离休）

旧小桥区区长王德风、旧台江区区长王仰前被免职。

福州解放初期党的重点工作是巩固政权，组织恢复生产发展经济。部队同志接管地方政权在人员少地区不熟悉的情况下，遇到几方面复杂情况。

泥沙具下 鱼龙混杂

区公所旧职员中与当官的裙带关系密切，派性严重，谁

好？谁坏？谁去？谁留真难决断。领导对旧职员先是全部留下来，维持现状开展工作。留用人员实行薪金制，以大米计算，每人每月一包大米（160斤），按当月米价折价发给人民币。南下干部和新参加的工作的同志，均实行供给制，服装由国家发给，伙食分大灶、中灶、小灶。伙食费到市政府报销。每月发有零用钱一、两万元（旧币），包括理发、香烟、肥皂费，女同志还有卫生纸费，到1952年—1953年才实行包干制，每人每月发10.5万元（即新币10.5元）。

解放前区公所助理员、雇员月薪法币一亿二千元至二亿元，只够买五六十斤至百斤大米。雇员刘锦文（解放后留用现退休）回忆说，旧政府实权派的生活补充靠“外水”，旧小桥区公所的民政助理员王昌銓在办理中选路百城（现在市第三印刷厂厂址）房产产权中就受贿不少黄金，后受到除名处理。他们说：好坏人相拖累，好的名誉也被坏的败坏了。旧台江区区长王仰前因早期接触共产党，受到党的地下工作者教育，有所觉悟，他任职期间拥护过地下党活动，福州解放时间对档案保留比较完整，受到表扬。

新小桥区第一任区长顾耐雨回忆说：对旧职员我党实行包下来考察使用。我党积极的措施是吸收工人积极分子，进步学生、社会青年参加到政府机关、公安部门工作，以新生力量取代于旧的渣滓。他们是经学习党的政策，提高当家做主人的思想觉悟后才参加工作的。福州刚解放，人怕国民党反攻大陆，请地方群众来参政实在是了不起的一桩大事。福州市人民政府于1949年9月招收一批干部，如刘学苏同志（现任仓山区人大主任），陈一正（现为市阀门厂厂长）分配到小桥区公所工作。刘担任财经见习助理员，张进管税收工作，陈云（顾耐雨爱人）管印章顾立当通讯员，工作分工

不分家，有事大家一起做。

廉政难行 陋习不改

旧的警察局、分驻所、侦探队的巡官、警长、警员、侦探，福州解放后党对他们进行为人民服务教育，办事以廉政制度约束，他们表现唯唯诺诺，背地里尽想捞“外快”。后洲派出所警察王中元回忆说：在后洲派出所的旧警察在解放初期还残留着解放前索取“外快”的陋习，他们凭管理渔牙、食品商户的外来人口和市容卫生的实权，以派出所值勤、巡逻用点等名义，向管辖户摊派柴、米、油、盐、鲜鱼、猪肉、蔬菜、干货，按街分段每天由渔牙送鱼，肉店割肉、小商交青菜按时送到所里，供给执勤警察免费就餐，炊事员还把过剩的食品整蓝整框地运回家，这样的陋习在解放后一段时间里被领导发现了，受到严肃批评才制止。另外，旧警察在解放前捞“外快”名目还很多，他们管理旅馆、戏院和半公开的妓院、鸦片馆，接触的是姨太头（鸨母）馆主，谁都巴结他们，警察、侦探在自己管辖内，白吃、看白戏、白嫖、白抽鸦片、坐白车，甚至尚要勒索一笔才罢休。黑社会帮派甚多，做贼有贼头、扒手头、乞丐头、麻疯头，这些头各有自己的后台靠山，盗贼、扒手、乞丐分地段偷东西，扒现金和行乞。谁偷盗、行窃得手谁就要“孝敬”头人大哥、警察、侦探经常可以在“大哥”处拿些钱花，如果偷到大人物头上，上峰动用权势逼迫破案时候，侦探们只要找来贼头讯问，就可索回赃物，他们行话叫“难吞的果子”，吃不进要去吐出来。偷盗扒窃那些过往富商，他们就认为交好运，那商人他们自认倒霉。

徬徨观望 脚踩双船

福州解放初期，社会治安环境极不稳定，到处是流言蜚语，谣言惑众，这对旧职人员思想干扰很大，他们认为共产党不一定信任他们，因而徬徨观望，“脚踩两条船”，身在共产党机关工作，心挂国民党一边，甚至精神寄托在神灵显应指路上，有的参加“一贯道”、“同善社”迷信帮会，经常去烧香礼拜抽签问卜，问国民党能不能再回大陆，共产党能否巩固政权？有的尚议论说：“泥腿子打天下有能力坐朝吗？李闯王造反开头来势也很猛，没多久就夸台了”。

旧职员对国民党撤离大陆之前，特务头子王调勋及国民党要员召开的应变会议的留言，心有余悸。有的潜伏下来的特务向旧职人员打招呼，他们寒暄应付，保持联系不断线，生怕有朝一日国民党回来日子不好过。在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的时候，有些人慑于过去干过一些坏事，怕受到处缢，自己私下溜了，仓惶偷渡出海潜向台湾。旧职员谢××（女）在福州解放不久就由白犬岛逃到台湾。旧职员陈光远，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发现他参加反共救国军反革命组织，被逮捕判刑五年。

由于他们是旧社会过来人，思想信仰守旧的原因，顾耐雨区长针对旧职员这些思想状况，通过开群众会、办夜校、走访重点对象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主要内容有：共产党是什么样一个政党；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工人阶级是国家主人……逐步把人们的旧思想转变过来，这在当时是最重要也是最难的事情。经过宣传教育，这些旧职人员大部分都自动离职，另谋生路，个别留下工作的至年龄到才退休。

福州解放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群众开始了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觉悟慢慢提高，党委和政府增添了新生力量，群众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新政权逐步巩固了。

说明：

这份资料是根据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一日老同志座谈会发言整理。关于旧警察的情况，系本人在解放后参加公安工作中，同留用人员相处工作中，听到事实和开展刑事侦察工作使用“特情”人员中获悉。

解放初台江区农村 减租与土改工作回忆

林 增 城

一、减租、反霸斗争

建国初期、原台江区农村分布在水部一带的有土山至状元境等12个自然村；在新港一带，有万寿至新港里等8个自然村；在茶亭一带，有浦尾至银湘浦等5个自然村；在瀛洲一带，有排尾至竹排埕3个自然村；在后洲的，只有一个菜园垱。农户住居分散，和城市居民混杂居住。

此外，1949年12月，从闽侯县划进一个江南乡，乡辖有20个保，分散住在闽江船上和下游两岸，从大桥下至峡北止，胥民中有一部分是半渔、半农、租种闽侯地主、富农的土地，生活较贫苦。

建国后的1949年10月上旬，中共福州市委派南下干部于春荃、师进等40多人工作队，分赴大根、台江两区农村，开展减租和组织农会等工作。

来台江区农村的工作队有师进等20多人，驻在琼东路（即水部街）琼水救火会楼上。工作队中成员有南下干部，人民解放军、福州地下党干部、青年学生、个别留用人员。他们白天分工到各村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以苦引苦，发动贫雇农，带动中农，参加农会，从中发现积极分子，物色农

会骨干。晚上回队部汇报与交流工作情况。工作队来的第一天均由保甲长带路入村。我的家乡是林纾的故居——水部莲宅村。来我村的工作队员是原中共地下党党员陈和光。他进村后深入农户访贫问苦，从中发现我是村中最贫苦的人，自己无土地、靠佃耕和做工生活。他从阶级教育入手，启迪我思想觉悟，积极协助他开展工作。发动佃农向田主实行“二五减租”。“二五减租”，分实物租制和固定租制两种。实物租制，即每百斤谷减25斤给佃农，剩下75斤，租佃双方各半，这样，每百斤谷子田主原来收租50斤改为37.5斤，佃农可得62.5斤，比原来多得25斤；固定租制，即原交租每百斤减25斤只交75斤。当时，田主多是城市开店的工商业户，只好按照政策规定执行了。不久，村里成立农会，本村农民选我为农会小组长、委员。

1949年11月10日，在琼水救火会大厅上，召开全区委员、小组长联席会议。会议由台江区区长姜彬主持、市委领导和全体工作队员参加。会上用无记名投票方式、由17个委员中选举区农会正、副主任。我由于得票最多，被选为正主任、林章聚（王树村人）、梁元柱（埕前村人）选为副主任。大会上市、区领导祝贺讲话：宣布全市第一批试点工作的台江区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了。号召全区农民团结起来，开展减租反霸斗争。会议在掌声和鞭炮声中结束了。

次日，10月11日《福建日报》在头版头条新闻报导，以大字醒目的标题：“昨天、大根、台江两区成立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黄万乐、林增城分别当选两区‘农协筹委会’主任”。这天，工作队员叶绍芬带我到各村熟识情况，登门访问副主任和委员。访问两天后，召开第一次“全委会”，订

出工作计划和制度，研究和布署了当前工作，进一步发动农民完成减租和反霸斗争两大任务。

当时，万寿村农民控诉当地恶霸林××，在国货路开一家铸铁厂。前几年扩厂时，厂后无偿占用万寿村农民俞依溪、俞虎梯的菜园，以及村中行人的通道。解放前，他借其弟、侄在旧政府当官的势力，欺压村里农民，农民对他敢怒不敢言。但他是我的同村人，按族间排辈，他是族兄，他托其侄和我的叔父向我求情，要我“高抬贵手”，饶恕他这个老人，被我严词拒绝。11月下旬，区农会决定在琉球会馆的广场上，召开全区农民斗争恶霸的大会。会前，我发现有他厂里的亲戚及我的叔父在会场中活动，拉拢一部分人准备捣乱会场。我立即汇报姜彬区长、命民兵把这些人拘留起来。将要开会时，天空乌黑、快要下雨了，忙把会场移至太保境庙中召开，这是解放后，全市第一次的斗争大会。附近居民也冒雨赶来参加。由于庙小人多，会场拥挤得水泄不通。大会由我第一次主持，上台讲了几句开场白后，万寿村苦主和农民代表上台控诉恶霸的罪行，群众无比愤怒。会场中口号声此起彼落、响彻云霄，气氛十分肃穆。事先预料不利，会场左边角有他内侄叶××在呼喊反面口号，被当场群众揪出抓上台，跪在台前陪斗。群众斗志昂扬，要求政府严惩恶霸。最后，姜区长讲话，支持农民要求、命民兵把恶霸带回区公所拘留。几天后，市人民法院张继中院长步行来农会，由我带路到万寿村访问苦主和农民。过了几天，市人民法院在吉祥山市救火联合会大礼堂设临时法庭、公审恶霸。除全区农民参加外，还有邻区农民和附近居民也来旁听。开庭时，张院长主持讲话，两旁陪审员有市工人代表陈水仿、农民代表黄万乐、林增城、吴世明，商界代表倪松茂、何培圃

等。张院长讲话后，万寿村苦主上台控诉，最后审判长叶于绍宣判。责令恶霸退出万寿村的公共通道，赔偿苦主的经济损失。

经过反霸斗争，推动了“二五”减租。11月26日，台江全区农村减租任务完成了。11月底，工作队全部折走，分赴鼓楼、小桥、仓山三个区的农村开展工作。

当时，从表面上看减租任务完成了，但实际上还存在明减暗不减的现象。

11月上旬的一天早晨，有一农民来农会诉说，蒋机轰炸台江码头，放一颗照明弹，码头至排尾一带的居民，惊慌失措，有几百人逃到田里，踩坏了庄稼，造成颗粒无收，要求免向田主交租。当日，我冒着空袭警报，不顾空中尚有蒋机盘旋，即赴排尾，洋中田间调查，帮助当地农民挖荸荠。边劳动、边同农民拉家常。从中了解到、蒋机放照明弹的那天，这一带的晚稻都已秋收完毕，并无半点损失，就是田里的土被他们踩实了，所以挖荸荠很吃力。刚好这丘田是德余的佃户陈金仙、陈金顺两兄弟的，我问他你们对他有否减租，他们说还不知什么叫“二五减租”（他俩是鼓山区象园乡的人，当时，工作队还没有来开展反霸减租工作）。他们按原租全数交给江德余了。原来江是“二地主”，用投标向“电光刘”租出大量土地，然后用高租转租给他们。我就调查有哪些人租江的土地？他们一一举出，我记下佃户姓名住址，并叫他俩通知属鼓山管辖的农民，明天上午八时挑空担来排尾江福寿（委员）家里开会，属台江管辖的排尾，尾垵的佃户我去通知。次日上午我带这些佃户到江的家中要回“二五减租”的稻谷，并批判江不老实，责令他如数向“电光刘”交租。从这次事件中，我悟到减租不彻底，就召开委员、小

组会议，布置各村普查佃农减租情况，果有个别户没有减租现象，就动员他们进行补减了。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秋收减租后，有的富农的田主看工作队撤走了，无人给佃农撑腰了，错误地认为农会刚成立，只有一人脱产参加工作，难免顾此失彼，即公开向佃户抽佃（讨田），他们担心出租的土地、土改时会被征收分配给农民，就企图抽回雇人自耕。有的佃户认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田被抽佃，影响明年生活，当然不肯被抽回，于是双方发生争执。我就用“典型示范”“杀鸡教猴”的方法，召开全区租、佃双方会议。委员、小组长全部参加。会上我选择家乡莲宅2户富农，一是我姑母林大妹，一是顽固户林大汉。这天晚上，大会在南公小学礼堂召开，会议一开始，就叫林大妹先说抽佃理由，她说后，我叫到会人评评理，“能不能抽”？会上除田主外，所有人都异口同声答：“不能抽！”我说：在未土改前，一律不能抽田，一抽就乱了。林大妹还要强词夺理，我命人把她赶出会场。她回家后大骂我无情无义，忘恩背义。（因解放前，我困难时曾向她借贷过）。第二个是寡妇富农林大汉。她“以寡卖寡”，借寡耍无赖，倒地捶胸痛哭，疯狂呼喊，企图别人同情她。我怒斥她，叫她爬起出门，她也乖乖起来走出会场。至此再无第三人再讲“抽佃了”。这会和前次反霸斗争会对各村震动很大。农民们私下议论：“选这样的人当主任，铁面无私，不徇私情，我们信得过。”从此，农会的威望在农民中日益提高了。

解放后，由于至1950年8月才搞民主建政，所以这段时间，城乡仍沿用保、甲长在基层进行工作。在农村中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民出门打路条证明，农副产品出售等都要农会

证明，农业生产、救灾度荒等工作也均由农会负责；此外还有组织各村民兵维持农村社会治安，组织“青妇队”站岗放哨，配合当地派出所抓坏人，以及办冬学、夜校扫盲等工作。农会脱产干部只有我一人。工作队离开后，我夜以继日地工作。当时农会迁址在国货路十字路口路通救火会楼上。我吃和住都在那里、便于农民早、午、晚来找办事，上下午和晚上则到各村开会等，帮助村中召开租佃双方会议，签订租佃协议书，具体内容：（1）实行二五减租；（2）不准抽佃。协议书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区农会存档1份。这样一来，使佃农吃了“定心丸”、安心耕种，肯花工，多用料，促进了当时的农业生产。

当时台江区尚未成立中共台江区委。我工作遇有困难时，就找姜区长请示汇报，有事和农会基层干部、群众商量。我深有体会、工作千万难，依靠领导的重视和群众的支持就不难了。

1949年12月，福建省政府决定，把闽侯县的江南乡划入台江区。该乡范围从解放大桥以下至峡北止。闽江下游水上和两岸的疍民。乡辖下有二十个保，居住分散在闽侯城门一带。当时住在鳌峰洲的只有3户。乡中有部分农民租种闽侯地主、富农的土地，过着半渔半农生活。

一月上旬，江南乡农会主任刘青山请我到江南乡各村宣传发动农民开展二五减租工作，在闽侯一区（今城门乡）区长郭宝枝的支持下，二十天时间，全乡完成了减租任务。同时，租佃双方也签订了租佃协议书。双方各执一份，乡农会存档一份。小桥区于12月底也成立农会，完成了减租任务。

1950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区农会召开了第一届农民代表会议，江南乡有四十个代表参加，到会有120人。会上，

我总结了农会成立以来五个月的工作，传达福州市郊第一届农民代表会议的精神，布置了春耕生产和救济度荒工作，台江区姜彬区长、市郊农会主任刘田莅临讲话，他两人一致肯定了五个月工作成绩，对今后任务提出指示。会期只开一天。

1950年7月，江南乡与小桥区江北乡合并成立水上区。8月、民主建政时，废除保甲制度，成立居民委员会。同时，水部一带12个自然村划入大根区；茶亭、洋中一带五个自然村划入小桥区。这样一来台江区农村和农民只剩下三分之一了。

1950年10月，台江区农会在台江区政府楼上召开全区第二届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台江区农民协会。代表们民主选举农会委员及正副主席。正主席仍由我担任，对副职作了调整，选杨淑爱（女）、吴世龙、刘歹佛三人为不脱产副主席、委员有颜祖淦、梁元贞（女）等11人。会上结合评定征粮的亩产量，但个别中农代表有意报低亩产量，企图减轻征粮的负担。会上亩产量定不下来。次日，我到万寿佃农郑乞食仔嫂田中参加秋收劳动，结束时，我帮她过秤记数减租、核对了亩产量。当时，姜彬区长在机关墙报上表扬我深入实际、落实产量。后来以此说服个别中农、核定的亩产量也无异议了，顺利完成征粮任务。

1951年冬至1952年春，区农会发动农民参加兴建闽江防洪堤、挖深瀛洲河等义务劳动、交公粮、认购，胜利拆实公债，归还到期农业贷款、捐献抗美援朝以及镇压反革命等工作，都出色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任务。小桥区农村也是这样的。

二、土地改革

1950年冬、中共福州市委在市郊鼓山区后屿乡进行“土改”试点乡工作。同时在该乡前村举办全市郊农村干部的“土改”学习班。当时这项工作由市委组织部部长郑重负责，我同杨淑爱（女）吴森林、郑仁官、吴赛雄（女）五人同去参加学习二十天，学习政务院颁布的《土地改革法》，听取了许亚市长、郑重部长等市委领导同志讲课报告。学习《农村阶级分析》等文章。学习班结束后，杨淑爱等四人参加市郊新店区工作队，我回区农会工作。

后屿乡土改试点结束后，全市郊土改全面展开。邻乡象园乡是当时属鼓山区面的土改。从1951年1月开始至3月结束。土改中结合“镇反”运动，全乡共镇压处决民愤极大的“翁老虎角”、“柯长头”等“反·坏”分子6人。1955年该乡的洋中村（今红星村）划入台江区；象园、雁塔两村与连潘等四个大队于1960年也划入台江区。

市郊4个区土改于1951年春耕前结束，市5个区的农村因地少人多，情况较为复杂，因此没有继续接下搞土改。

1951年夏收后，中共市郊工委派王楠等5人来台江区农村调查土地、人口及农会干部政治情况。小桥区农村同时也由郊委派叶庆麟等5人去调查。这时，台江区农会副主席杨淑爱调去龙江居委会当主任，副主席刘歹梯因作风不好被撤职。小桥区农会主席被撤换，副主席许友于调区工会工作。换上王军、陈新燕当区农会正副主任。调查工作三个月结束后，两区农村调查组扣回郊委另行分配工作。台江区农会增补了颜德仪（女）梁元炎2人为农会委员。

1952年春耕后，郊委在大根区农村搞市区农村土改试点

工作、至六月该区农村土改结束后，工作队分赴四个市区农村开展土改工作。全市由杨守文负责，每区派五人组成土改工作组。派来台江区农村土改的有吴洪、林碧等五人，同时小桥区农村也派五人。土改从6月15日开始，至7月10日结束，前后只有25天。工作分三个阶段：（1）动员发动、宣传土改政策；（2）划分阶级成份，群众评议，张榜公布，三榜定案；（3）没收、地主、征收富农、工商业的出租土地，分配给佃农。

根据市区农村地少人多的特点，与市郊土改采取不同的方法分配土地：（1）分田只分有佃耕的纯农业户，其他成份无佃耕的不分；（2）分到的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不得出租和出卖。政府不发“土地证”。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时，应无条件服从；（3）不作平均分配，按全区土地人口的平均数，照顾原耕原佃户，采取摘多补少，按整丘土地，就多一点也不另划出分为两户。减少田埂占用耕地面积。把上述政策界线向群众宣传，保证耕者有其田。农民满意，其他人也无异议。按农民俗称为“土整”。

在划分阶级成份时，根据各户调查的经济情况，自报公评，张榜公布，立榜定案。全区农村共评出成份：工商业地主1户。（在市郊土改时已评了成份，本区则不评）、富农2户、中农（包括佃中农、中渔民）53户。贫农101户，雇农1户、自由职业6户、小贩4户、养牛者1户、贫民15户、小土地出租6户、小贩4户。

在划分成份的阶级中、结合斗争恶霸1人批判坏分子2人。

全区农村共征、没收土地310.459亩，分配108户（其中贫农101户、雇农1户、佃中农6户），留下机动田62.649